

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唐礼智 刘喜好 贾璇

内容提要:本文以金融发展为视角,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对 1987—2006 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以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 Kuznets 倒 U 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未发现类似现象;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 U 型关系均不成立。不同地区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取决于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面板数据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 2007 年达到 3.32:1。根据林毅夫(2007)的预测,按照目前情形,未来 10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如果能以平均每年 7% 的速度增长已是相当不易,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也很难低于 9%,因此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有可能持续。城乡差距继续扩大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文献综述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多从经济水平、产业特性、人力资本、体制变迁和制度变革等方面进行探讨,而从金融发展角度对城乡收入差距开展实证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最早正式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是 Greenwood & Javanovic (1990)。他们在 Kuznets 假说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反映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模型,证明了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服从“倒 U 型”曲线。Gabr & Zeira (1993)和 Benerjee & Newman (1993)以信贷市场不完善作为模型的基本假设,分别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选择角度研究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初始的收入差距未见得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Aghion & Bolton (1997)、Piketty (1997)、Matsuyama (2000)从信贷市场均衡和利率的角度分析了金融部门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过程,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中,生产效率也比较低下,因此存在财富不平等现象;而到了金融市场有效和生产率水平比较高的阶段,收入分配状况就会逐渐收敛于平等的稳定状态。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差异是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内在基础。Townsend & Ueda (2003)则在 Greenwood & Javanovic (1990)模型的基础上,以更统一的动态模型讨论了金融深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动态演化路径,论证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 Kuznets 曲线。

在实证研究方面,Benabou (1996)、Li, Squire & Zou (1998)较早提供了金融深化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Honohan (2003)、Motonishi (2004)通过观察检验一些新兴和转轨经济中金融发展与贫困程度的关系,证实了金融发展与降低不平等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Clark, Xu & Zou (2003)对

1960—1995年 9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得出收入差距随着金融中介发展而缩小的结论,但没有发现如 Greenwood & Javanovic所提出的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的倒 U型关系。

不过, Lamoreaux(1986)、Haber(1991)、Maurer & Haber(2003)等人对金融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的研究认为,随着金融市场的深化,最有可能从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发展中获利的是那些已经在位的高收入阶层,而非穷人和低收入阶层,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近几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的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分配间关系的研究。章奇、刘明兴、陶然(2003)运用 Clark, Xu & Zou(2003)的研究方法,利用我国 1987—2006年省际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数据样本中并不成立。姚耀辉(2005)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存在着一种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 Granger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且两者具有双向的 Granger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研究的视角和结论可能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支持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的观点。与原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在分析层面上,本文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结合起来进行实证研究,改变长期以来单纯从国家层面或单一省份开展实证分析的传统;二是在模型设定中,选择从规模和效率两个层面来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并纳入到具体的面板数据分析之中,改变目前模型分析中多重视规模而忽视效率所带来的相关问题。

二、实证分析

(一)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设定

根据实证分析目的,综合已有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几组重要因素:

1. 区域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取决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本文引入金融相关比率(FR)和金融发展效率(FE)两个指标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金融相关比率是度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的综合指标,指的是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与当期国民财富之比,但在实证检验中,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常采用全部金融机构的存贷款余额和与当期名义 GDP的比率作为替代指标。金融发展效率是度量区域金融发展效率的综合指标,在本文研究中,参考王志强、孙刚(2003)的建议,采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率来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

2. 城市化。城市化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一方面通过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减少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报酬水平,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陆铭、陈钊(2004)的研究也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选用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其城市化指标(用 UR表示)。

3. 产业结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要素将从边际生产力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边际生产力较高的非农业部门,直到这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收入也相等为止。因此,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中现代部门即非农产业的比重越高则意味着城乡差距可能会越小。本文选取第二、三产业产值的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所考虑的产业结构指标(用 ISG表示)。

4. 经济开放度。我国引进外资的投资区位大部分集中在城镇地区和城郊地区,因此外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增加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本文选取外国直接投资额占 GDP比例来表示一个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用 FDIG表示),也作为一省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

5. 政府经济行为。一般来说,地方财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越高,城镇地区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获取的好处越多,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大(周文兴,2002)。本文选用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来衡量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指标(用 GBG表示)。

(二)模型设定与估计

根据上述设定的影响因素,本文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构建 4 个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比较分析。所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ln(GAP_{it}) = a_0 + a_{11} \ln(FIR_{it}) + a_{12} [\ln(FIR_{it})]^2 + a_{21} \ln(FE_{it}) + a_{22} [\ln(FE_{it})]^2 + a_{31} \ln(UR_{it}) + a_{41} \ln(ISG_{it}) + a_{51} \ln(FDIG_{it}) + a_{61} \ln(GEB_{it}) + \varepsilon_{it}$$

式中,下标 *i*和 *t*分别代表第 *i*个省份和第 *t*年。*a*₀是截距,是残差项,它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被解释变量 *GAP*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它是反映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FIR*和 *FE*之所以加入二次平方项主要是考察是否存在所谓的 Kuznets倒“U”型现象,如果二次项系数小于 0而相对应的一次项系数大于 0则表明倒“U”型关系成立。另外,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所有变量都取自然对数。

计量所采用的数据主要取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包括除海南、重庆、西藏以外的共 29 个省份 1987—2006 年的统计数据。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辽宁,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西部地区包括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四川。

在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时,先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以决定使用哪种形式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的检验方法是首先利用 Breusch-Pagan(1980)的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是选取混合回归模型还是面板数据模型;若确定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再利用 Hausman(1978)设定检验来判断是选取固定影响模型还是选取随机影响模型。判断结果显示,4 个模型均适用面板数据模型,其中全国适用随机效应模型,东、中、西部地区适用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计量结果见表 1。

表 1 模型的计量结果(1987—2006 年)

项目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i>a</i> ₁₁	0.7756 ** (2.87)	0.1196 * (2.35)	2.6100 ** (3.30)	- 0.7769 (- 0.80)
<i>a</i> ₁₂	- 0.7459 ** (- 3.62)	- 0.4974 ** (- 2.62)	0.3872 * (2.92)	0.6211 * (3.52)
<i>a</i> ₂₁	- 1.2520 ** (3.33)	- 0.7446 (- 1.14)	- 2.9285 ** (- 3.36)	1.5396 (1.30)
<i>a</i> ₂₂	0.1024 * (2.39)	0.8812 ** (2.69)	0.3220 * (1.68)	0.4715 * (2.56)
<i>a</i> ₃₁	1.1125 ** (7.52)	0.2419 * (- 2.88)	- 0.0271 (- 0.05)	- 1.8460 * (- 4.17)
<i>a</i> ₄₁	- 1.3969 ** (- 5.01)	- 2.3955 ** (- 2.75)	- 0.8154 (- 0.51)	- 2.8926 * (- 5.74)
<i>a</i> ₅₁	- 1.0024 ** (- 27.33)	- 0.8233 ** (- 11.51)	- 0.5918 (- 0.82)	- 1.3140 (- 1.05)
<i>a</i> ₆₁	- 1.5791 ** (- 8.31)	- 1.4444 ** (- 3.40)	- 1.5452 (- 1.94)	- 0.0804 (- 0.08)
Adjusted R ²	0.73	0.96	0.86	0.72
F	192.62	140.97	29.78	9.85
DW	1.61	1.77	1.98	1.54

说明:括号内为 *t*统计值; *、** 分别表示在 10%、5%的水平上显著

(三)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 1 可知,4 个模型中 Adjusted R²、F、DW 等统计指标显著,模型拟合效果较好。据此,本文可以得

到以下的判断:

在金融发展规模上,全国的 $a_{11} = 0.7756 > 0$, $a_{12} = -0.7459 < 0$; 东部地区的 $a_{11} = 0.1196 > 0$, $a_{12} = -0.4974 < 0$, 显示全国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差距之间服从 Kuznets 倒“U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上,全国的 $a_{21} = -1.2520 < 0$, $a_{22} = 0.1024 > 0$; 东部地区的 $a_{21} = -0.7446 < 0$, $a_{22} = 0.8812 > 0$, 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并不存在倒 U 型效应。上述结果意味着,从金融发展效率来看,全国和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本文认为,我国金融发展效率滞后的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资金的趋利性特征促使农村地区的储蓄资金绝大多数被用于城市工业化发展,导致存款转化的大部分贷款最终流向城市地区,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农村金融支持系统的薄弱成为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这与曹广喜等(2007)对江苏省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另外,在控制性变量方面,除城市化指标外,其他变量都符合预期假设。全国和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与陆铭、陈钊(2004)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原因可能是考虑的样本对象以及模型中的控制变量的选择不同。

中部地区的 $a_{12} = 0.3872 > 0$, $a_{22} = 0.3220 > 0$, 同时,西部地区的 $a_{12} = 0.6211 > 0$, $a_{22} = 0.4715 > 0$, 表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 U 型关系均不成立,而二次项大于 0,则进一步预示中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不仅不利于其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相反有可能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主要与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偏小和金融效率低下有关。

从金融发展规模来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非常明显。就储蓄资源的分布而言,1990—2006 年我国东部地区储蓄存款绝对额不仅超过中部、西部两个地区的总和,而且相对比重也由 1990 年的 57.22% 上升到 2006 年的 68.31%; 具体到金融机构贷款的分布,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相对份额从 1990 年的 55.09% 上升到 2006 年的 68.56%,而中部地区的贷款份额从 30.13% 下降到 14.85%,西部地区贷款份额则基本稳定在 14% 左右。因此,以金融机构储蓄和贷款的相对规模为标志,东部地区控制经济资源的能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中西部地区则居于明显的弱势。

从金融发展效率来看,中西部地区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信贷需求和供给。一方面,中西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抑制了农村的金融需求。经济发展落后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低,从事高附加值生产活动的愿望不强,农村经济活动不活跃,从而抑制了当地农户的金融需求;同时,在中西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高、风险大,从而被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边缘化。因此,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与全国整体金融发展程度相比还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农村金融体系未能有效发挥金融资源的配置功能。另一方面,中西部农村资金外流现象有增无减,加剧了农村金融供给的短缺。中国人民银行的调研数据显示,1993—2003 年,仅西部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年均增长速度就高达 8.8%。作为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三个重要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社,国有商业银行基层网点撤并、贷款权限上收以及向“储蓄银行”发展的趋势直接削弱了基层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广布乡间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分散了稀缺的农村资金来源,加剧了农村资金的“非农化”;农村信用社在遭受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两种外力作用的同时,自身发展也陷入严重困境,不良贷款难以消化,亏损包袱依然沉重;信用社改革不彻底,资金投向偏向政府指导项目,管理模式流于形式等,导致其吸储能力低,存款余额增长慢,影响了农村信用社的信贷业务发展。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全国和东部、中部、西部两个层面,对 1987—2006 年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以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作为衡量指标,全国和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服从 Kuznets 倒“U型”曲线条件,而在金融发展效率方面却未发现类似现象;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倒 U 型关系均不成立。不同地区金融发展

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关系的迥异取决于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的表现。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一是集中政策力量加快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积极鼓励和吸引新型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打破国有银行在中西部地区的垄断地位,促进金融机构向多元化发展,使得资金的配置以效率和福利为导向,推动金融支持结构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可通过税收优惠、新增存款回流等一些行政性安排把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引入农村金融市场,有效遏制农村资金外流,健全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系统。同时,注重信贷的投放方向,控制非农活动和消费贷款增长,切实将存款资金变成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有效推进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合作。加快制定地区金融合作规划,并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推动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合作由当前的初级阶段步入产品研发、服务创新、资金融通等实质性的阶段。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主要症结是改革不到位. 人民日报, 2007 - 08 - 22
2. Greenwood, Jeremy and Boyan Jovanovic (1990).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1076 ~ 1107
3. Gabor, Oded and Joseph Zeira (1993).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 (1): 35 ~ 52
4. Banerjee, Abhijit V. and Andrew F. Newman (1993).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 (2): 274 ~ 298
5. Aghion, Philippe and Bolton, Patrick (1997). A Trickle-Down Theory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Debt Overha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 151 ~ 172
6. Piketty, Thomas (1997). The Dynamics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and the Interest Rate with Credit Ration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4
7. Matsuyama, Kiminori (2000). Endogenous Inequal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7
8. Townsend, Robert M. and Kenichi Ueda (2003). Financial Deepening, Inequality, and Growth: A Model-Base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F Working Paper 13 (193)
9. Benabou, R. (1996). Inequality and Growth,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1996, Ben S. Bernanke and Julio Rotemberg, eds., 11 ~ 74, Cambridge: MIT Press
10. Li, Squire and Zou (1998).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and Intertemporal Variations in Income Inequa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08
11. Honohan, Patrick (2004).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Poverty: How Close Are the Link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03
12. Clarke, George, Xu, Lixin Colin and Zou, Heng-fu,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 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984, March 2003
13. Lamoreaux, Naomi (1986). Banks, Kin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New England Cas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56: 47 ~ 67
14. Haber, Stephen H. (1991).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azil, Mexico, and United States, 1830-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59 ~ 80
15. Maurer, Noel and Haber, Stephen (2003). Bank Concentration, Related Len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exico, Stanford University mimeo
16. 章奇, 刘明兴, 陶然, Vincent, Yiu Por Chen. 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金融学, 2003 (1)
17. 陆铭, 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 2004 (6)
18. 姚耀军.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 财经研究, 2005 (2)
19. 周文兴.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经济科学, 2002 (1)
20. 王志强, 孙刚. 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管理世界, 2003 (7)
21. 曹广喜, 夏建伟, 冯跃. 区域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经验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经济地理, 2007 (5)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段 艳